

传世名著百部

楚

辞

之

蓝天出版社

郭超
夏于全

主编

传世名著百部

文学与文艺理论名著·第四十卷

(全100部64卷)

蓝天出版社

第四十卷目录

传世名著百部之《楚辞》

●名著通览	(3)
●全文	(15)
离 骚	(15)
九 歌	(30)
东皇太一	(30)
云中君	(31)
湘 君	(32)
湘夫人	(33)
大司命	(35)
少司命	(36)
东 君	(37)
河 伯	(38)
山 鬼	(38)
国 殇	(39)
礼 魂	(41)
天 问	(42)
九 章	(57)

惜 诵	(57)
涉 江	(60)
哀 郢	(63)
抽 思	(65)
怀 沙	(69)
思美人	(72)
惜 往 日	(74)
橘 颂	(77)
悲 回 风	(79)
远 游	(84)
卜 居	(91)
渔 父	(93)
九 辩	(95)
招 魂	(105)
大 招	(116)
惜 誓	(124)
吊屈原	(128)
鵬 鸟	(130)
招 隱 士	(134)
七 諫	(136)
初 放	(136)
沈 江	(138)
怨 世	(141)
怨 思	(143)
自 悲	(144)
哀 命	(147)
謬 諫	(148)

哀时命	(152)
九 怀	(159)
匡机	(159)
通路	(160)
危俊	(161)
昭世	(162)
尊嘉	(163)
蓄英	(165)
思忠	(166)
陶璜	(167)
株昭	(168)
九 叹	(170)
逢纷	(170)
离世	(172)
怨思	(175)
远逝	(177)
惜贤	(180)
忧苦	(182)
愍命	(185)
思古	(187)
远游	(189)
九 思	(193)
逢尤	(193)
怨上	(194)
疾世	(196)
悯上	(197)
遭厄	(199)

悼乱	(200)
伤时	(202)
哀岁	(204)
守志	(206)
乱曰	(207)
●名著评点	(209)

传世名著百部之

楚辞

名著通覽

大约两千多年以前，在中华文明耕耘播种的丰土沃壤之上，当以黄河流域为文化背景，以现实主义精神为艺术特征的文学鸿篇《诗经》诞生 300 余年之后，以长江流域为文化背景，以浪漫主义精神为艺术特征的另一朵文学奇葩——《楚辞》，在诗苑中翩然绽放开来，同时以它特有的磅礴气势和艺术魅力在我国古代诗歌园圃中浓香四溢，独擅风采，开创了中国文学浪漫主义诗歌的第一个光辉典范。与诗园经典《诗经》共同构建了我国古代诗歌创作的两大不朽源头。从此，在我国文学史的巍峨殿堂上，形成了双珠竞彩、“诗”、“骚”合璧的灿烂景观。

两千多年来，《楚辞》始终是我国古代文学研究领域的一项重要内容，长盛不衰，而它对后人的影响，则已显然超出文学的范畴，被涵纳在文化发展史的广阔空间背景里，而且以屈原为代表的楚辞文化也已在世界范围内显示了深远的意义和价值。以下，试从几个主要方面，对《楚辞》进行简略的介绍。

1. 《楚辞》的名称

“楚辞”一词，最早见于《史记·酷吏列传》，其中的张汤传称：“长史朱买臣，会稽人也，读《春秋》。庄助使人言买臣，买臣以楚辞与助俱幸”，不过这里的“楚辞”也还不是

作为专书的名称出现。《史记·屈原贾生列传》又称：“屈原至于江滨，被发行吟泽畔。……乃作《怀少》之赋。”《汉书·艺文志》亦记：“屈原赋二十五篇。”这样的记载至少说明“赋”的称法在汉代是比较普遍的。不过，如果从渊源上考查，还是“辞”之名为最早的提法，这也可以在《史记·屈原贾生列传》中找到线索：“屈原既死之后，楚有宋玉、唐勒、景差之徒，皆好辞而以赋见称。”汉代班固作《离骚》赞序时讲屈原的创作契机是“明己遭尤作辞也”，继而解释说：“屈死之后，秦果灭楚，其辞为众贤所悲悼，故传于世。”看来，较为合乎情理的结论是，“辞”当为战国时期，楚国在诗体上的一种固有称谓。

秦灭六国，重点表现为军事上的成功，在文化上的影响十分有限，“辞”体作品不称于世，则是极其自然的事情。汉代推崇黄老之学，老子出身楚国，楚地文化受到统治阶层的一致重视，“辞”体作品也随之得到青睐。汉初的几个皇帝都有过“征天下能为楚辞者”的记载，汉高祖的《大风歌》、汉武帝的《秋风》皆类于楚声，这对《楚辞》的流传产生了重要作用。

“赋”是汉代最流行的一种文体，实际上它是脱胎于楚辞的一种新兴的文学体裁，之所以讲“屈赋”或“楚赋”，大概是照顾到汉人的习惯，只是形式上的一种便称。由于赋体与辞体渊源上关系密切，所以辞赋连称在汉代并无不妥。而且汉初有所谓“骚体赋”，几与楚辞相当。随着汉赋的成熟，具有浓郁地方特色的辞体作品，便被逐渐还原为它本来的样子。“楚辞”一语，始成定称。

2. 《楚辞》的背景

“楚辞”是战国时期在我国南方楚国地区出现的一种新型

诗体，经过以屈原的创作为代表的一系列作品的问世，最终形成了一代丰富而完整的文学样式。从作品的表现形式来看，《楚辞》绝然不同于此前出现的《诗经》。按说战国时期激剧动荡的社会背景，为南北文化的广泛交流提供了充分可能，《楚辞》从内容到形式都应该受前者的重大影响。可令人惊讶的是，这种影响虽然不同程度地存在，但两者的不同却更为明显和强烈。《楚辞》以鸿篇长句见称，且绝少章句重复，里面包含有大量带有楚地巫风与神话色彩的文学意蕴，其篇章内容含量的丰富性，句法组织的灵活性，都非《诗经》所可比拟。这不禁使我们对孕育这种特殊体裁的楚地文化产生了浓厚的兴趣。

在中华文明历程的时间表上，楚地是一个文明发展较晚的地区。春秋早期，它还只是一个默默无闻的小国，经过数百年战争兼并，楚国势力急剧膨胀，至战国时期，已跃为首屈一指的泱泱大国，不但在疆域上称雄四方，而且民族成分的复杂程度也为其他诸侯国所不及。不过当时楚国有相当一部分地区的生活水平，尚处在原始氏族社会状态，因此，楚国不论在经济上，还是制度上，都与中原文化存在着一定的差距。而制度、文化的滞后，使楚国形成了不同于中原地区的历史文化的积淀，人们相对淡薄宗法思想、礼教观念以及伦理意识，为宗教风习的流播，培养了深厚的情感基础。非理性的精神素质与浪漫不羁的直觉心态相契合，自然和谐地将楚地杂陈遍布的巫术、神话、仙道内容糅合为一个整体，转而注输到楚人社会生活的众多层面，给楚国文学的创作提供了丰富的题材，诱发出变幻多姿、浓郁艳丽的文学意象。

当然，这种文学意象是通过不断吸收已经存在的风格多样的“楚语”、“楚声”、“楚歌”、“楚调”的基础上而完成的。

宋代学者黄伯思曾总结说：“屈宋诸骚，皆书楚语，作楚声，纪楚物，故可谓之楚辞”（《校定楚辞序》）。诚如此说，《楚辞》中许多远古社会的遗风余绪，特别是洋溢着炽盛的巫风气息的篇章，便寻找到渊源上的归属。

3. 《楚辞》的收集

“楚辞”虽然创成于战国时期，但它最初流传的情形，估计还是以单篇的形式出现的。近年来，在安徽阜阳汉代汝阴侯夏侯灶墓遗址中，发现过两片《楚辞》残简，一为《离骚》，一为《涉江》，墓主在世时间距屈原之死约百余年，这是有实物证据的最早《楚辞》文本。另据有关学者考证，在此之前，楚国的宋玉曾辑《离骚》、《九辨》成书，堪称是《楚辞》结集之滥觞。关于汉代收集《楚辞》的情况，则有《汉书·地理志》为我们提供大概：

“始楚贤臣屈原被谗放流，作《离骚》诸赋，以自伤悼。后有宋玉、唐勒之属，慕而述之，皆显名。汉兴，高祖王兄子濞于吴，招致天下娱游子弟枚乘、邹阳、严夫子之徒，兴于文景之际。而淮南王安亦都寿春，招客著书。而吴有严助、朱买臣，贵显汉朝，文辞并发，故世传《楚辞》。”

上文列述了两个主要的收集群体：其一是吴王刘濞及其招纳的“娱游子弟”。这里有一位重要人物，即枚乘。目前，文学史上以枚乘和他的《七发》作为汉赋正式产生的第一位作家与第一部作品，而严夫子即庄忌（“庄”因避汉明帝讳而改作“严”），是现行本《楚辞》中《哀时命》一篇的作者，他的儿子正是庄助。庄氏父子对《楚辞》的兴趣相当浓厚。后来，庄助和朱买臣先后因精通《楚辞》而见幸于汉廷，与此关系甚密。由此可见，吴地在《楚辞》的收集活动方面成效十分卓著。其二是淮南王刘安及门下士人。刘安本人创作过

《离骚传》，他的属地以寿春为中心，这是楚国最晚建立的都所在地，作为楚国故地，想必在收集楚地旧辞方面有许多便利的地方。经过这两方面的积累，再加上汉代高层统治者对《楚辞》的大力推崇，《楚辞》一类的作品在汉初的一段时间里，得到了可能范围内的复原。

4. 《楚辞》的篇目

据载，淮南王刘安曾取宋玉辑本为底本，增入《九歌》、《天问》、《九章》、《远游》、《卜居》、《渔父》诸篇，并附自创《招隐士》1篇，合计9篇，奠定了《楚辞》的大体规模。西汉刘向编校《楚辞》时，又补《招魂》、《九怀》、《七谏》等篇，附己作《九叹》1篇，共计13篇。此后，又经人陆续添入《哀时命》、《惜誓》、《大招》3篇，成16篇。东汉王逸据16篇，再编入自己的《九思》一篇，终成17篇，即我们现在所看到的17卷本的《楚辞章句》。因刘安、刘向诸本久已失传，故此王逸的《章句》本便成为最早最完整的读本。

王逸在《离骚后序》中说：“后世雄俊，莫不瞻慕，舒肆妙虑，续述其词。逮至刘向典校经书，分为16卷。”这16卷中，他可以断定是屈原作品的有7卷25篇，计：

《离骚》1篇

《九歌》11篇

《天问》1篇

《九章》9篇

《远游》1篇

《卜居》1篇

《渔父》1篇

· 另外九卷根据王逸说法，分别是：

《九辨》1篇，宋玉作

《招魂》1篇，宋玉作（司马迁则认为是屈原之作）

《大招》1篇，或为屈原作，或为景差作（朱熹以为属景差，从词采看，当非屈氏之作）

《惜誓》1篇，或为贾谊作（其实已可肯定为贾谊之作）

《招隐士》1篇，淮南小山作

《七谏》7篇，东方朔作

《哀时命》1篇，严忌作

《九怀》9篇，王褒作

《九叹》9篇，刘向作

5. 《楚辞》的作者

楚辞作为一种成熟的文体，其最重要的开创者和最具代表性的作者，当首推屈原。从现存的楚辞作品来看，不论在篇幅上，还是在数量上，都无出其右者。更重要的一点是，在质量上，他取得了无人能够匹及的卓越的艺术成就，使其成为中国诗歌史上乃至文学史上最具艺术创造性和艺术感染力的巨擘之一。

屈原，名平，字原，战国时期楚国人，司马迁称其为“楚之同姓”（《史记·屈原贾生列传》），大致出身于和楚王同姓的贵族阶层。根据今人胡念贻先生的考证，其出生年代约为公元前353年，他年轻时曾得楚怀王信任，被任命为左徒，史称他“博闻强志，明于治乱，娴于辞令”（同上）。后来上官大夫嫉恨他的才能，进谗怀王，使其见疏，改任三闾大夫，掌楚王族三姓，这是他政治生涯的转折点，也是他展现文学才华的契机。从此，楚国的政治也步入了一个风雨飘摇、每况愈下的时期，楚国在与秦国多次的冲突较量中，始终处于被动不利的地位，屈原本本人由于横遭贬斥而被迫离开郢都，谪居汉北。此时他怀着满腔积愤创作了不朽的名篇《离骚》。怀

王三十年（公元前 299 年），秦军伐楚，秦昭王约请怀王在武关相会，怀王受骗入秦，三年后客死异地。随后，楚顷襄王即位，对待屈原一仍其旧，十分冷淡，在令尹子兰的唆使下，上官大夫再次进谗加害，终致将屈原放逐到江南一带，使其政治生涯彻底断送在旧贵族势力的联合夹击之中，而此际的楚国更是势若累卵，岌岌可危。顷襄王三十一年（公元前 278 年），楚都郢被秦攻破，楚国陷入空前的灾难，屈原辗转于沅、湘一带，所谓“被发行吟，颜色憔悴，形容枯槁”（同上），最后行至汨罗江畔，在极度悲愤和绝望中，自沉江中，其时约在公元前 277 年～前 276 年间。屈原政治生涯的不幸反过来造就了他文学事业的辉煌，他具有代表性的作品几乎都产生于这样的背景之下。因此，他的诗篇不论是思想性还是艺术性，都显示出极其丰富的内涵和极其凝重的基调。这无疑是他所处的时代赋予的特征。

继屈原之后，最有影响和富于个性的楚辞作家是宋玉。宋玉也是楚国人，生卒年代史载不详，主要活动于顷襄王在位时期（公元前 298 年～公元前 263 年），王逸称他是屈原的弟子，实际上这样的可能性并不大。据说他在相貌和仪表上很出众，而且辩才过人，估计做过小臣，长期不甚得志。他的辞赋颇得顷襄王的喜爱，但由于周围小人的排挤，连小臣的地位都没有保住，以至潦倒终生。宋玉一生创作颇丰，《汉书·艺文志》载有 16 篇，而《楚辞》中收录的可以确定为其作品的只有《九辩》1 章 9 篇，在写作方法上借鉴了屈原的艺术表现手法。宋玉的艺术成就主要表现在对“赋”体作品的开创上。他在政治上虽未像屈原那样抗言直谏，却亦能够保持超然独处，养成了孤傲自负的个性，在艺术上，他的才华又是显而易见的，其传世的作品如《风赋》、《高唐赋》、《神女

赋》、《登徒子好色赋》等，在后世影响极大。如果仅以文学创作本身而论，他在继承和发展屈赋的基础上，创作了更具文学特征的作品，这一点是他超越了前人的地方。后人在讲楚辞时，往往有屈宋并称之说，原因即在于此。

景差，是与宋玉大致一个时代的人，亦曾列官于楚顷襄王。具体生卒年代已不可确考，但其好辞赋而师法屈原这一点却是可以肯定的。他曾与宋玉、唐勒同时称名于楚国的文坛，在艺术成就上则远逊于屈宋。

贾谊（公元前200年～前168年），西汉人。汉文帝时，受人荐举，被召为博士，官至太中大夫。他本想有所作为，却受朝中大臣忌害，遭贬为长沙王太傅，几年后改为梁怀王太傅。后梁怀王不慎坠马而亡，贾谊因此自伤不已，自叹为傅无状，忧愤成疾，抑郁而死，年仅三十三岁。《汉书·艺文志》载其作品58篇，其中辞赋7篇，《楚辞》中收录了《惜誓》1篇。

淮南小山，此处“淮南”指当初淮南王刘安，“小山”者史载不详，王逸称“小山之徒，闵伤屈原，身虽沉没，名德显闻，与隐处山泽无异，故作《招隐士》之赋，以彰其志”。一般认为，淮南小山未必是作者的名号，或可解释为刘安门下的宾客。《楚辞》存录其《招隐士》1篇。

东方朔（公元前154年～前93年），字曼倩，西汉人。武帝时上书自荐，令待诏公车。为人滑稽诙谐，虽被作为倡优看待，却敢于直言极谏，但始终未得重用。《楚辞》存《七谏》1篇。

庄忌，西汉人，生卒年代不详。好辞赋，初仕于吴王刘濞，与邹阳、枚乘等以文才见称，后从梁孝王游，受到器重，号严夫子。《汉书·艺文志》载其赋24篇，现仅存《哀时

命》1篇。

王褒，字子渊，西汉人。汉宣帝时受益州刺史荐举，被任命为谏议大夫，多次从帝游猎。后太子得病，宣帝命其前往益州行祭金马、碧鸡二神，病死道中。《汉书·艺文志》载其赋16篇，今《楚辞》存《九怀》1章9篇。

刘向（公元前79年～前8年），字子政，西汉人，汉高祖弟楚元王刘交的四世孙。为官历宣帝、元帝、成帝三朝，在古籍整理方面成就最大。《汉书·艺文志》载其赋33篇，《楚辞》存《九叹》1章9篇。

王逸，东汉人，生卒年代不详。汉安帝时为校书郎，顺帝时官至侍中，由于著有《楚辞章句》而称名于世，同时亦将自己的拟作《九思》收录其中。

6. 《楚辞》的研究

关于楚辞，可以说自其问世之始，便在中国文学史上产生了强烈的震撼，因此对它的研究从来是代不乏人，形成了诸多流派大家，造就了蔚为大观的一门自成体系的“楚辞学”。按照今人王仲番先生的提法，可以把古代的楚辞研究分为五大流派，即训诂派、义理派、考据派、音韵派、词章派。而姜亮夫先生则归纳为四大类别。其一义理类，亦称辑注家，即在训诂的同时更注重解题，是楚辞学史上影响最大、成就最著的一类，重要代表如东汉王逸的《楚辞章句》、宋代洪兴祖的《楚辞补注》、宋代朱熹的《楚辞集注》、明代汪瑗的《楚辞集解》、清代王夫之的《楚辞通释》等。其二音义类，主要从字音方面入手，以求正确的训诂，如隋代道骞的《楚辞音》（残卷）、明代陈第的《屈宋古音义》、清代江有诰的《楚辞韵读》等。其三考证类，如晋代郭璞的《楚辞注》（今已不存）、宋代吴仁杰的《离骚草木疏》、清代胡文英的《屈骚指